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

爱日精庐文稿

张金吾 著 郑永晓 整理



凤凰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爱日精庐文稿

张金吾 著

郑永晓 整理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日精庐文稿 / 张金吾著 ; 郑永晓整理.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5.5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2辑)

ISBN 978-7-5506-2124-4

I. ①爱… II. ①张… ②郑… III. ①张金吾 (1787~1829) —文集 IV. ①Z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50648号

- | | |
|---------|---|
| 书 名 | 爱日精庐文稿 |
| 著 者 | 张金吾 著 郑永晓 整理 |
| 责 任 编 辑 | 张永堃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岗西路9号, 邮编: 225008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5.375 |
| 字 数 | 140千字 |
| 版 次 |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124-4 |
| 定 价 | 25.00元 |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14-85868858)

存史鑑今

袁行霈題



袁行霈先生题辞

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
知音，千載其一身！
知音之今，讀新編，稀見史料，
刊，真有治學知音之感也。

傅璇琮謹書

二〇一二年

傅璇琮先生題辭

殫精竭慮旁搜遠紹
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
料庫

王水照
二〇一三年
一月

王水照先生題辭

宋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吳縣黃氏士礼居舊
藏轉入汪氏藝芸書舍金吾從之影寫一券笑
川此本又從金吾藏奪傳錄者嘗見藏書家
得一宋元舊籍輒思秘之帳中噫此何說也古
之人讀書稽古萃一生之心思才力以成一書
矣萃一生之心思才力以成一書而歷七八百年
幾經兵火舊槧如新抑又難矣愛古者碎
金片石斷塼剩瓦猶且公之同好互相激賞况
書籍為作者精神所寄靈爽所憑者与得之

者其七思古人成書之難何如流傳之難何
如今既幸為己有冥之中鄭重付託大望後
之人廣為傳布者又何以乃謬為愛藏秘
不示人甚且無所也是書傳本絕稀今一時
頗有三四分維藝芸主人不吝通假之功寔
多其諸得古人傳之其人之意者乃道光泰
年八月上漸張金吾書





张氏爱日精庐（常熟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

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罕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罕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 1840—1949 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罕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罕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罕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

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裱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勉励,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們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前 言

叶德辉在《常熟顾氏小石山房佚存书目序》中曾言：“常熟为江南名县，其士大夫喜藏书，自为一方风气。以余所知，前明有杨五川七桧山房、赵清常脉望仙馆，储藏之富，远有师承。其后继之者，为毛子晋汲古阁、钱牧翁绛云楼。绛云火后，余书归族子曾述古堂。甲宋乙元，转相传授。乾嘉之际，有张月霄爱日精庐、陈子準稽瑞楼，近今犹有瞿子雍铁琴铜剑楼。盛矣哉！以一邑之收藏，为中原之甲秀。余友庞纲堂寺卿撰《常昭志》，至以藏书家别为列传，以褒扬之。此固他郡县所未有者也。”^①按《光绪常昭合志》特设藏书家一门，其类序云：“自来郡邑志乘未有以藏书家立一专门者。岂斯例之不可创欤？抑岂人之不多觐也？独吾邑以藏书之名著闻于海内者，自元明迄今，踵若相接，其遗编散帙，流传四方。好事者得之，或谓海虞某氏之所收录，或谓琴川某人之所题识，以相引重。”^②张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后序》亦云：“常熟藏书家远有端绪。自明万卷楼杨氏、脉望馆赵氏、绛云楼钱氏，递相祖述，汲古毛氏实集其成。羽翼之者述古钱氏，近之爱日、稽瑞两家继之。蕞尔一邑，储藏之富，甲于东南。”^③足见常熟藏书传统源远流长，名家辈出，对中国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传播起

① 叶德辉《郎园山居文录》卷上，上海书店《丛书集成续编》第144册据《郎园先生全书》影印本。

② 《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人物志》十一之三。

③ 清光绪刻本《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末。

到了重要作用。

叶德辉、张瑛等提到的爱日精庐主人张金吾是清嘉庆、道光时期常熟著名藏书家。张金吾(1787~1829),字慎旃,别字月霄。清江苏昭文(今常熟市)人。著名藏书家、目录版本学家。嘉庆间,年二十二补博士弟子员。寻即弃去,以庋藏、校勘、汇刻先贤文化典籍为己任。在先辈藏书基础上,汇收群籍,得八万余卷。辟“诂经堂”、“诗史阁”、“求旧书庄”以藏之。从季父海鹏校刊群书,考据精当。尝以列朝文苑,惟金源氏多散佚,搜辑二十年,乃成《金文最》百廿卷。又采宋元以来经部著述八十余种,纂辑《诂经堂续经解》一千四百三十六卷,以补清初署名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之缺失。又撰《爱日精庐藏书志》四十卷。另有《释冕》、《释弁》、《释龟》、《广释名》、《两汉五经博士考》、《十七史引经考》、《白虎通注》等著述,总计约二百余卷,皆贯穿详核,言之有据。《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有传。

张金吾出身于藏书世家。曾祖张朝绩,字亦中,号东岩,著有《闻涛轩诗稿》二卷。祖父张仁济(1717~1791),字敬堂,一字傅霖,晚号讷斋。好读书,年逾七旬不倦。家有“照旷阁”,藏书万卷,多宋元旧刻。有《讷斋存稿》。父张光基(1738~1799),张仁济长子,字南友,一字心萱。笃学敦行,嗜学好古。继承张仁济“照旷阁”藏书,并益加购藏。取《汉书》“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之意,创设“诂经堂”,突显其注重经书收藏的意愿。著有《心萱遗诗》。

张金吾幼年不幸,十三岁时其父张光基卒。十六岁时,其母因操劳过度,心力交瘁,亦卒。此后在其叔父张海鹏养育下成人。据张金吾自编年谱《言旧录》载,其母“病革,以金吾属叔父若云公。命金吾曰:‘汝能读书循理,惟叔父命是听。吾目瞑矣。’”张金吾所言叔父若云公,即常熟著名藏书家张海鹏。张海鹏(1755~1816),原名荣基,字若云,一字子瑜,年二十一补博士弟子员,三试不中,遂绝意名禄,笃志于坟典。生平乐善好施,创设从善局,施济四穷,月给赡养。嘉庆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二。张海鹏在毛晋《津逮秘书》基础上,增删编

订《学津讨源》二十集，又刻《墨海金壶》七百余卷，《借月山房汇钞》十六集。又辑《金帚编》，未克完成而卒。《常昭合志稿》卷三十二有传。

黄廷鉴有《朝议大夫张君行状》述张海鹏生平事迹甚详。据《行状》，张海鹏曾云：“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视区区成就一己之学业者，其道不更广耶！”因而“拳拳于流传古书，至老弥笃”。而张海鹏刊刻校书之严谨认真，黄廷鉴亦有精彩描述：“性好劳恶逸，黎明即起，漏三下不息。迨梨枣役兴，手一编，丹铅左右，恒彻晓了无倦容。延致好学知名之士，相与分校。订讹析缪，细心咨访，间有不合，断断辩论，必洞彻无滞而后已。”^①张海鹏这种严谨的刻书态度必然对张金吾有所影响。据张金吾《言旧录》，嘉庆九年（1804）叔父张海鹏校刊《学津讨原》等书，间命金吾校讎，偶有订正处，辄为叔父许可。

张海鹏尤为人称道者是其扶危济困、和顺悌睦的品行。其中对侄金吾的抚育一再被时人称赞。黄廷鉴《朝议大夫张君行状》云：

君性友爱。伯兄光基暨继嫂邵相继弃世，孤金吾年才十五。嫂氏临终，付托君经理丧事。毕，挈金吾反步道巷。旧宅相依，延师课读，视同己子。释服后，为之授室。合葬兄嫂于宝岩新阡。遗产及一切琐务，君亲自经纪之。逮金吾游庠，方以家务畀之，惟恐少负丘嫂重意。

张金吾对叔父的养育也铭刻在心，念念不忘。在文章中多次言及，如：“太孺人疾亟，以金吾属叔父。既卒，叔父抚金吾如子，以教以养，且为经理田产……时时以读书敦本、无隋家声为勖。”（《叔父若云府君家传》）“金吾少孤，从父若云公命居‘诗礼堂’旧第，以养以教。”（《重建“传望楼”记》）“弟少遭孤露，照旷从父视如己子。以教以养，

① 《第六弦溪文钞》卷四。

幸得稍有成立。”(《与鹿樵从兄求呈进金文书》)

张海鹏在藏书、刻书方面对张金吾的影响很大。黄廷鉴《张月霄传》载：“(金吾)少孤，性颖敏，喜博览。比长，学为考据，尝从季父海鹏校刊《太平御览》诸书，钩稽审核，见者称焉。”张金吾《叔父若云府君家传》载：“叔父尝语金吾曰：‘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藏书者好名，非好学也。读书者为己，不为人也。若刻书，则上以寿作者，下以惠后学，绵绵延延，传之无极。夫成就一己，不若成就天下后世之人为愈也。吾老矣，不能力学。惟就吾力之所及，成就天下后世之学者，是吾之志也。’”显示出一位藏书家难能可贵的宽广胸怀和以传承文献为己任的雄心壮志。前引叶德辉《常熟顾氏小石山房佚存书目序》又云：“余恒言，藏书而不知刻书，何异骨董行客；刻书而不知藏书，亦棚铺枋肆所优为，何与于表彰先哲，嘉惠来学之事。”此论开明、通达，与张海鹏的藏书、刻书理念颇有相通处。而张金吾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时显然从张海鹏的经历和教诲中受益颇多。

由于参加科举不利，张金吾很快放弃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尝试，而立志于以刊刻传播先贤文化和撰述成家。据黄廷鉴所撰《藏书二友记》载，张金吾与同里陈揆相友善，其藏书亦相埒：

月霄之藏弃，后于陈君十年，不数载而富与之埒。储藏之名，今遂并甲于吴中。四方之名士，书林之贾客，挟秘册，访异书，望两家之门而投止者，络绎于虞山之麓、尚湖之滨。嘻！盛矣。

但是张金吾的藏书理念与陈揆颇有不同。黄文记载：“两君志趣同，而各有所主。张则钟于经籍，而兼爱宋元人集；陈则专于史志，而旁嗜说部。其大较以网罗散佚、存亡继绝为宗旨。其于书也，张则乐于人共，有叩必应；陈则一室静研，慎于乞假。”张金吾所作《〈稽瑞〉跋》对于二人在藏书理念方面的区别亦有描述：“子準尝曰：‘书贵缄秘，